

师说,我与宋史

——文研学术·包弼德、伊佩霞、包伟民、邓小南在北大文研院的座谈

2017年1月6日上午,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主办的“北大文研论坛”第十八期“师说,我与宋史”在北大静园二院208会议室举行。此次活动由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主持,哈佛大学副教务长、文研院特邀访问教授包弼德(Peter K. Bol),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伊佩霞(Patricia Buckley Ebrey),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,北大文研院院长、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结合自身研究经历,就怎样读书、怎样写论文等问题为学生们答疑解惑。

我为什么研究宋史

赵冬梅:各位老师最初为何选择宋史作为研究领域,又为何留在这个领域?四位老师都可以说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了宋史研究,宋史究竟有何魅力长久地吸引了各位?

伊佩霞:我一开始并不是做宋史的,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从汉到唐的中国贵族家庭,做的是博陵崔氏的个案研究。但是1978到1979年的时候,我决定转向宋史研究,因为我决定继续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家族。宋史研究的资料比唐史研究丰富很多,宋朝出版物、笔记的数量能让我继续研究这个题目。而我留在宋史研究领域是因为我对宋朝的印象非常好。我喜欢宋代的艺术、喜欢士人作为社会主导阶级的理念、喜欢宋朝的城市生活。当时谢和耐的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》有英文版,对宋朝的城市生活有浓墨重彩的描述。宋朝有一种文明的理念,用文明抵抗军事。而我们那一代人都反战。宋朝也是一个避免战争的时代。

包弼德:我本来也不是学习宋史的。我研究中国历史是因为对当代中国有兴趣。我生长在一个左派家庭,家人的政治观比较接近社会主义。在家庭的影响下,我年少的时候觉得应该要多学习一点关于中国的知识,因为中国有社会主义。1966年,我入莱顿大学,正好是“文革”开始的时候。不到一年我就开始检讨,觉得当时中国的状况更有需要反思的地方。可是我一直以来都对历史感兴趣,当时莱顿大学的一位教授开了一门研讨课,那是我们项目模仿美国的模式第一次开研讨课。研讨课的主题是南宋的杭州,讲到《梦梁录》。当时我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历史,看《梦

梁录》发现书中展现的是已经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。后来,我就比较能接受中国的近代是从宋朝开始的想法了。唐宋变迁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变迁,对历史学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课题,因此,我就开始学习宋朝历史了。但是我的研究领域不仅限于宋史,而是从8世纪到16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史、思想史。

包伟民:研究宋史对我来说是“被选择”的过程。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认为,假如有第二个选择,我不会选择历史。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工程学。我今天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说自己的兴趣。1977年10月恢复高考,那时我初中毕业五年,绝不可能在参加高考的时候考理科,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没有化学和物理课,而且作为一个初中生在教室里上课应该也不超过一年。当时我们参加学工、学农、挖防空洞、野营、拉练等各种各样的活动,没有正正经经上课。这是第一个“被选择”的过程:我不能选理工科,只能选文科。当时文科只有三个专业可以选:政治、中文和历史。我作为一个经历过“文革”的人,不喜欢政治。我也不喜欢中文,因为我觉得中文系就是写小说,我也不看小说。剩下只有历史了。后来考研究生,杭州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老师研究的是法国史。我不喜欢法国史,所以就选了国史。我也不喜欢近代史。于是只剩下古代史可以选择,而古代史唯一的老师是教宋史的,所以我选了宋史。

当然我后来留在宋史研究领域,还是有一点主观能动性在里面。其实还真有一段时间我想离开宋史。90年代后期,我有段时间转向了江南地区的地域研究,那个时候我一天到晚在小镇走,江浙一带农村的小镇还没有商业化,非常宁静祥和,我觉得非常愉快。还有一个很大的推动力是:我们研究古代史的对一个话题感



包弼德:“研讨课讲到《梦梁录》,我发现我其实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历史。书中展现的是已经非常具有现代性特征的中国。”



《梦梁录》为南宋吴自牧撰,仿《东京梦华录》体例,多描述南宋末年临安(今浙江杭州)的风俗、郊庙、人物、伎艺,于当时的社会状况,巨细不遗。上图为王云五主编丛书集成初编《梦梁录》全1-3册(商务印书馆,1939)书影。

兴趣,要看很多书,但真正落实到这个题目又会发现材料永远不够。相比较而言,我曾经从事过的民国历史研究材料实在太多,需要判断好几十条材料里面哪一条值得引用。我会觉得被埋在近现代的材料里了,我不是太理得清哪些是核心的、重要的,就是邓老师常说的“牵动性”的材料。而我对宋史相对熟悉一些,因而宋史对我而言更有吸引力,这样我就回到宋史。

邓小南:我跟包伟民老师有些地方是类似的,有被动的一面。很多人可能想,我学宋史是顺理成章的,因为我父亲做宋史,所以我自然做宋史。其实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没有“文革”,我自己当年作为一个初中生的理想是做一个文学家。我上初三时,北大附中语文组的沈礼荣老师指导我写一篇文章,叫《中学生怎样写作文》,准备登在当年的《中学生》杂志上。这对我是很大的鼓舞,让我觉得将来可以尝试写文学作品,当作家。“文革”期间,上山下乡,逐渐感觉自己的浪漫色彩不够,所以放弃了这个目标。

我和包伟民老师一样,考大学的时候选择范围很有限。

我没有参加77年的高考,因为当时我父亲说,如果初中生能考上大学,这还叫大学吗?我觉得说得很对,所以77年我就没报。我在北大荒十年,其间当过小学老师,后来我发现,我在那个偏远的农村小学教的学生,有的考上了重点大学。学生写信来报喜,同时也问老师为什么不考大学。在环境氛围鼓舞下,78年就参加了高考。当时就想找一个离政治远一点的专业,所以就选择了历史。那时候北大文史学系招生分数最高,法律系、经济系取分比较低。吴志攀校长曾经半开玩笑说,北大历史系在他们天津只招一个学生,他当时也报历史系,但被成绩更高的荣新江老师挤下来了,就“只好去学法律”。

上了大学以后,我跟包伟民老师有一点不同,我从来没有上过宋史课程,因为当时没有老师教宋史。我自己关于宋史的初步知识,是从张广达老师的通史课《中国古代史》里学到的。我们大二时,王永兴老师和张广达老师开了《敦煌学研究》,我们跟着这两位先生真正进了历史学的门。那时候星期六排半天的课,所有的星期六下午,王永兴老师和张广达老师会带着选课的学生读

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和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,我对职官制度多少有些了解,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当时选修课少,选择余地小,我们班41个人大概有十多位选这门课。到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,就碰到这样一个问题:如果大家都去考隋唐史,班里的同学肯定会自己挤自己。于是我决定报当时很少人报的宋史,然后就一直在宋史这个方向里。

其实并不是事先认为宋史有多大一片天地,但是进来以后发现,宋史的好处是空间比较大。所谓“空间比较大”,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:一是从近代以来,先秦秦汉史、魏晋南北朝史、隋唐史都有新材料出现,也都有非常扎实的研究;宋史研究跟这些朝代的研究相比,不很成体系,深度也不够,所以研究的空间很大。现在说“宋代历史的再认识”,其实就是说这个领域的研究有些方面没有那么成熟,一些成说定论也还值得斟酌,再认识的空间相对开阔。另一方面,也是指材料的开拓、利用这些方面空间比较大。如果跟先秦史、魏晋南北朝史或者隋唐史研究者的研究方式比一比,就